

## 壹、導論

由於階級經常是政治鬥爭或社會衝突的根源，自馬克思（Karl Marx）以來，社會學者始終關注階級不平等（Marx & Engels, 1998; Tilly, 1998），階級不平等展現在物質收益與非物質收益各方面，可以導致代內階級不流動或代間的階級複製，階級流動則可能緩和政治衝突（Huntington, 1968）。<sup>1</sup>教育制度常被認為是影響代間階級流動的重要因素。近年來，臺灣高等教育的擴張究竟能否改善社會弱勢家庭子女的教育成就，或是導致更嚴重的貧富分化，經常成為學界與媒體關注的焦點（戴伯芬、林宗弘，2015）。臺灣的高等教育擴張，究竟促進了階級流動，還是造成階級分化，或者改變了階級再製的機制？

相對於前工業化社會的封建世襲制度，「自由派的工業化理論」（liberal industrialism）通常將教育視為現代社會的階級流動管道之一（Erikson & Goldthorpe, 1992），是以「功績主義」（meritocracy），例如能力或成績，而非家庭背景作為拔擢人才的制度（Blau & Duncan, 1967）；而對資本主義階級流動的前景較為悲觀的階級複製理論（class reproduction theory）則持不同觀點，例如馬克思主義認為教育是一種以隱諱的方式複製並合法化工業社會階級不平等的制度，資產階級、中產階級或優勢族群（例如美國白人）的小孩，可以從對其有利的制度裡脫穎而出（Bowles & Gintis, 1975）。在教育擴張對教育機會影響的跨國研究文獻中，Shavit與Blossfeld（1993）指出，多數工業國家雖然都經歷教育擴張，但階級不平等卻仍然存在，僅在少數北歐國家有所改善。

---

<sup>1</sup> 本研究所稱階級，是以經濟資源所有權的分類差異（例如勞方與資方）來描述或分析社會不平等的結構（Erikson & Goldthorpe, 1992; Wright, 1985），在某種分類標準下（例如新馬克思主義或新韋伯派），代內或代間由一種階級類別流動到另一種階級類別，被定義為階級流動。

臺灣戰後曾經歷兩次高等教育擴張。1970年代前後，爲了回應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政策所需的技術勞動力，政府主導擴張專科學校及技職體系學校。因此，這一波高等教育擴張，多半集中在與高中學歷平行的技職學校或專科。在1990年，高等教育階段（18～21歲）人口的在學率僅達兩成，顯示大學教育仍以服務少數學術菁英爲主（黃毅志，2011）。在1994年的教育改革運動壓力下，1996年由官民共組的教改會提出《總諮議報告書》，要求開放高等教育機會與多元的入學管道，教育部則藉此機會放寬了私立學校升格的限制（何明修，2011）。結果，擴張後的大專院校總數高達163所，包括15所專科學校、32所學院及116所大學，學生人數達113萬人，高等教育階段（18～21歲）在學率將近七成（68.27%）。

在臺灣，針對1990年代以前工業化時期的社會學研究，證實了國民義務教育對中、下階級民眾的社會流動有正面效果，而高等教育擴張則能減弱高等教育的階級不平等（吳乃德，1997；莊奕琦、陳晏羚，2011；蔡瑞明，2008；謝雨生、黃美玲，2004；蘇國賢，2008；Tsay, 1997）。近年來的統計分析顯示，臺灣教育成就的性別不平等因教育擴張而有所改善（蔡淑鈴，2004），在考慮語言資本或軍公教補貼制度等教育機制之後，族群身分對進入高等教育的影響力亦有下降（吳乃德，2013；陳婉琪，2005；陳婉琪、溫郁文，2010），但高中學生之社會經濟背景差異與技職分流，對其進入高等教育甚至研究所升學機會的影響仍然存在（黃毅志，2011）。近年來，臺灣的大學錄取率已達到九成以上，然而，隨著臺灣民眾的貧富差距與相對剝奪感惡化，階級流動的夢想卻似乎愈來愈遙遠（林宗弘，2013），高等教育擴張真能促進階級流動嗎？

本研究討論近年來臺灣高等教育擴張對階級流動的影響，檢驗「極力維續不平等」理論（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MMI）、「有效維續不平等」理論（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MI）對教育擴張與階級流動之關聯的假設，說明高等教育擴張如何導致階級複製而非促進階級流動。延伸過去教育階層化對教育垂直差異的討論，在教育擴張的情況下，來自不